

老将新声

——裘廷梁与钱基博的白话文辩论

徐佳贵

表面上看，裘的立场较小他三十岁的钱更“新”；但实际上二人各有倾向与洞见。裘廷梁仍视“形式”学习的投入与“思想”更新为“彼长必致此消”的关系，更重视如何节约前者，以为后者腾出空间。反倒是钱基博，较多注意新文化人关于白话文“改造”本身的思考。

裘廷梁（1857—1943），字葆良，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民国初年始以别字行，本文仍通称裘廷梁）。今人通常想到的是他在戊戌维新时期主办《无锡白话报》（自第5期起更名《中国官音白话报》）的事迹，而在该报停办后，历史的聚光灯似乎从他身上彻底移走。事实上，裘廷梁一生关注白话文，他晚年编定的《可桴文存》，专门辟出“白话文”一大类，这一做法在其前辈的文集中堪称罕见。五四时期，他与同乡后进钱基博（1887—1957）之间的一场辩论，也值得从这位白话文运动先驱的角度，再作一番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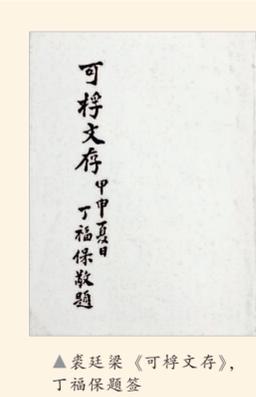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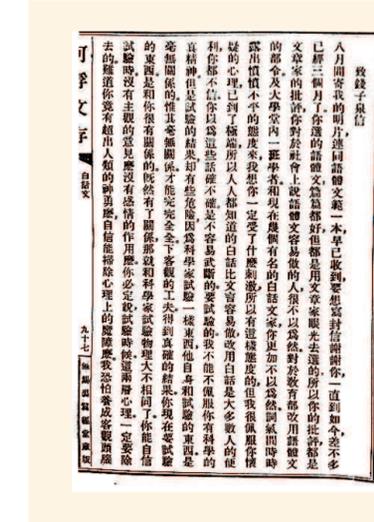
1920年，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員钱基博编撰成《语体文范》一书，7月出版后，于8月间便寄赠一册给时已寓居上海的裘廷梁。约三个月后，裘廷梁致信钱基博，对该书展开批评。此次二人往来信件共计四封。1920年末至1921年初，裘廷梁的两封信（总第一、三封信）连载于无锡地方报纸《新无锡》的副刊《新无锡墨林》；钱基博的两封信（总第二、四封信）载于无锡的另一大报《锡报》。其间双方所用文体与讨论主题一致，即都是用的白话文。

在《语体文范》中，钱基博强调，白话文也必须重章法、讲修辞，因此不见得比文言文易做。裘廷梁则视白话文较文言易做理所当然、妇孺皆知，第一封信中便对钱的意见感到难以理解。他强调，文字本身与其说足以成“学”，不如说是“求学的器具”；他将文言比作“金类的鼎彝”，白话则为“磁（瓷）类的瓷碗”，虽然瓷器“有精粗美恶的不同”，但粗瓷器“也一样可以达到他使用的目的”。当前国势危殆，“万不能再用鼎彝”，国人亟需者乃“日用品”而非高级玩物，故此“白”进“文”退的革新势在必行。

这一思路，不宜径以简单粗暴视之，而是与他在清季的思考实践有明确的连续性。如所周知，晚清以降白话文运动的通常思路，是以之为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普及”手段。裘廷梁与不少同辈有所不同的一点是，他认为中国传统上民众“读书”的机会其实不少：“微独士族，商人子弟，尽人而读之；工之子弟读者七八，农之子弟读者十五六，少者一二年，多或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年十三四而后改就他业，尤多者。”问题是，这种普及流于表面，因读书之后依然“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商不知角逐，工不知创造，农不知变瓷为膏腴”，这一“学究教法不善”，二因“中国文义太深”，对于“文义太深”，他以为“设法浅之而可矣”（《无锡白话报》序）。换言之，裘廷梁实是早早将问题要害转向了多数人读书的“效益”，即如何通过读书产生真正适宜的“思想”，以此指导实践、强国富民，而非仅仅考虑如何将读书的机会与行为本身予以普遍化。

在此思路基础上，裘廷梁宣称：“进化何待？恃文字。其与人，犹衣食之不可一日离也，故他国文字，为布帛，为菽粟，而吾国乃以为珠玉，固宜天下之寒饿者多矣。”（《锡山秦氏文抄序》）“布帛菽粟”与“珠玉”的对比同前述“瓷碗”与“鼎彝”的对比如出一辙，均体现了裘氏对文字文学的十足工具性的理解。他曾对比先秦与秦汉以后之文，称“周秦间善为文者，皆有绝类离伦之学，挽回世运之志”，之后两千年来至今日，则是“文愈富而愈愈贫”。倘若真正改良风气，便唯有重新将学习重点从“文”这种形式，移向“思想”或“学”之类的“蕴于内者”（《覆秦淡如先生书》）。

对“文”的这一态度，与裘廷梁对“新学”“科学”的热情直接相关。在当时背景下，“蕴于内”的“学”，无疑应当包括、甚至有时会主要指向“新学”。戊戌维新阶段，裘廷梁即对其时盛行的“中体西用”说表示反感，讥之为“以牛为虎、以马为用”，“不明格致治平之理，欲前复却，坐失时机”，这一讥讽后来得到严重的引用（《复严几道书》）。其间，他尤重可以比附中土格物致知之学的自然科学，其推崇“科学”的立场之坚定，在其前辈之中实属佼佼者。在相当程度上，这又是基于他对中外历史的整体理解。其时，一种“U型”西洋史分期，即辉煌的古典时代一黑暗的中世纪—近代西方复兴的三阶段分期，已经传入中国。中土趋新知识分子合本国历史对上古三代之尊崇与此种外来分期，也开始鼓吹辉煌的先秦时代一消极负面的秦后二千年一有望



▲裘廷梁《可桴文存》，丁福保题签

▲钱基博《语体文范》，吴清望题签

化危为机的当前时段这一三阶段的历史观，并为各阶段注入新的内容重点。裘廷梁着力凸显“秦前三千年”与“秦后（有时称汉后——引者注）二千年”在学风与文风上的差别，后来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成一体之“国粹”论。他称，先秦孔、墨诸子重视真正的“格物”之学，此为“中国真正的‘国粹’；孔子所谈的‘物’‘器’即是百姓人人所知之‘物’‘器’而非别有所指，只是秦汉以后士人越发轻视器物与劳力，专务神秘缥缈之学，致此‘国粹’中绝。至于西人，则在数百年前将西方自己的‘科学’重新光大，发扬至今，中国倘要再度研求‘国粹’，眼下便‘不能不假道于西人’（《国粹论》与《从任孙稚翁书》）。

要之，裘廷梁以中西各有“国粹”，而科学为中西“国粹”的共通之点，其动机、内容与一般抱残守缺者迥不相侔。他是基于“非科学不足言国防，非科学不足言生产”的现实判断，意欲打消国人对于文化判分问题的无尽纠结，破除国人深入探究近代科学与不少同辈有所不同的点是，他认为中国传统上民众“读书”的机会其实不少：“微独士族，商人子弟，尽人而读之；工之子弟读者七八，农之子弟读者十五六，少者一二年，多或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年十三四而后改就他业，尤多者。”问题是，这种普及流于表面，因读书之后依然“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商不知角逐，工不知创造，农不知变瓷为膏腴”，这一“学究教法不善”，二因“中国文义太深”，对于“文义太深”，他以为“设法浅之而可矣”（《无锡白话报》序）。换言之，裘廷梁实是早早将问题要害转向了多数人读书的“效益”，即如何通过读书产生真正适宜的“思想”，以此指导实践、强国富民，而非仅仅考虑如何将读书的机会与行为本身予以普遍化。

在此思路基础上，裘廷梁宣称：“进化何待？恃文字。其与人，犹衣食之不可一日离也，故他国文字，为布帛，为菽粟，而吾国乃以为珠玉，固宜天下之寒饿者多矣。”（《锡山秦氏文抄序》）“布帛菽粟”与“珠玉”的对比同前述“瓷碗”与“鼎彝”的对比如出一辙，均体现了裘氏对文字文学的十足工具性的理解。他曾对比先秦与秦汉以后之文，称“周秦间善为文者，皆有绝类离伦之学，挽回世运之志”，之后两千年来至今日，则是“文愈富而愈愈贫”。倘若真正改良风气，便唯有重新将学习重点从“文”这种形式，移向“思想”或“学”之类的“蕴于内者”（《覆秦淡如先生书》）。

事实上，裘廷梁虽极力主张白话文，但也没有确证表明他要尽废文言。清末时，他曾与坚决反对白话文的同乡友人邓濂（似周）争辩文白优劣，其间提出“好古者任自为之”（《复巢盒集》序）。五四时期，在致钱基博的第二封信中，裘廷梁所认为的可以让少数人之为之的“文章”“文学”，依然主要指向文言。

相比之下，钱基博对新文化人大力“改造”白话文、从而让白话文在担负普及之责以外再主宰“少数”文化高才之领域的意向，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对新文化人实现该意向的信心颇不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钱、裘二人的侧重点其实是错开的：裘廷梁重视“多数人”福祉与“少数人”才性的分别为第一位的问题；而钱基

博则聚焦于本身足以成“学”的“文”。表面上看，裘的立场较小他三十岁的钱更“新”；但实际上二人各有倾向与洞见。裘廷梁仍视“形式”学习的投入与“思想”更新为“彼长必致此消”的关系，更重视如何节约前者，以为后者腾出空间。反倒是钱基博，较多注意新文化人关于白话文“改造”本身的思考。

在收到裘廷梁的第二封信后，钱基博复信说，自己的观点是“语体文也不容易做”，却被对方扣上“反对语体文……反对普及教育”的帽子，只好无奈地表示“不说了，敬祝您老人家健康”。同时，钱基博又致信同乡友人李康复（歙渊，1890—1967），谈论此事，称裘廷梁他老人家“盛气虎虎”“真正老当益壮”，只是对自己存在莫大的误会。但钱基博还是说：“现在地方老辈像他老人家肯拿‘教育’两个字做前提来教训我们，狠是不多，无论他的话怎样，他的意思终是正当。”钱氏请李康复将此番辩论文字编入1921年的《无锡县教育会年刊》，也肯定了裘廷梁“作文”是为“试

验思想”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有助于反思当前国文教学中“咬文嚼字”的弊端。

裘廷梁后来也称，这场辩论和晚清时自己与邓濂的辩论内容、方式“绝异”，但均可供“治无锡报史、教育史之资料”（《犀盒集》序）。这位白话文运动“老将”在五四时期的思考，以及地方性辩论中同样复杂的思路交织，在今天依然有余音绕梁，耐人寻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论衡

教书匠的假期

王宏超

说起教书匠，尤其是大学教师，人们的第一印象永远是，一年有两个假期，竟然那么闲。每到假期，也经常有老师出来辩解，说自己其实很忙。但谁信呢？一年三个月假期呢！

较之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时间压榨，老师们的假期似乎就是社会分工不充分所遗留下的奢侈品，让所有人都羡慕嫉妒恨。其实众人还不大知道西方大学中有一种更为奢侈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 / Sabbatical Year）制度。据说这一制度源自犹太民族的传统，据摩西律法，每到第七年，应该停耕田地，休养生息。1880年哈佛大学首创学术休假制度，满七年的教师可以休假一年。这一做法也被西方大学所普遍采用。在宣称“失败者才睡觉”的24/7时代（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老师们的时间福利就更令人眼红。要不是因为收入太少，恐怕地球上所有聪明的脑袋都会涌上讲台。于是，相对于时间的自由、闲适，清贫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必要的代价，安贫才能乐道。有穷酸先生就自我打趣说：

诸公莫说教官穷，说起穷来不算穷。中轿居然安七尺，上台也只打三躬。老夫子叫人人是，外翰林称个个同。日上三竿犹未起，胜他多少磕头虫。（《滑稽诗文》）

裘起的懒觉确实比较多，但熬夜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知是为了展示教师这个职业真的繁忙，还是为了减少一些旁人的艳羡目光，老师们常把熬夜当作自己的职业标签。有时白天消磨了大把时间，就等晚上喝着咖啡，充满愧疚感地试图把白天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但熬夜却不会让他们的学问变好，就像巴尔扎克所说：“很多人认为咖啡可以使人头脑清楚，但大家也应该发现，讨厌的人，喝了咖啡之后反而更令人讨厌。最后，即使巴黎的食品杂货店营业到深夜十二点，某些作家也没有因此变得更有才华横溢。”（《论现代兴奋剂》）

老师们为什么需要假期？1907年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目前大学普遍建立的授予教授周期性休假的制度，不是为了教授本人，而是为了大学教育……事实上，在任何地方，暑假都是用来休养生息的。对于真正的大学教授而言，学术休假是智力和实践上的必需。”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定会令时下很多提议取消教师假期的人更为不满，都去休假，指标数据如何完成？但据一份1932—1936年清华大学休假教师成果清单来看，休假教师发表率为百分之百，是当时全国专科以上教师发表率的7.1倍，是清华全体教师的2.6倍（李红惠《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研究》）。不知管理者诸君，看到这个数据，会不会考虑强迫老师去休假了。

马克斯·韦伯说，在学术研究领域，灵感在学术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在艺术领域小。而灵感如何到来？“想法的来去行踪不定，并非随叫随到。的确，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之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以学术为业》）这就需要假期了。

其实，处在加速度状态中的现代社会，老师们把假期该有的闲暇状态也丢掉了。时间的节奏令人喘不过气来，老师们丧失了本雅明所言的深度无聊状态，那曾是“梦之飞鸟”，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是创造力之源泉。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沉思的专注力才能解读悬乎不定之物，隐蔽或飘忽即逝之物。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进入悠长、从容的状态。”（韩炳哲《倦怠社会》）。

但似乎，这种安闲在假期里也找寻不到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关文发先生与明清史研究

陈长琦



关文发先生肖像

2016年，著名历史学家关文发先生因病于广州辞世，享年86岁。关先生是广东南海人，生于1931年，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后，长期为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开设“中国通史”“明清史专题”“明清史籍举要”和“明清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后又兼任行政领导工作，在母校工作三十年，为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返回故乡广州，任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会顾问等职。先生为人庄重沉稳，关爱后学，不慕荣利，潜心学问，深得学界赞誉。今年正值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先生的缅怀。

关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尤精于明清史。在明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均有涉猎与建树，而对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则着力最多，影响最大。其代表作有论文《试论明代内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试论明代督抚》《明代翰林制度考述》，著作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等。

内閣、督抚、翰林，是明代重要的三项政治制度。尤其内閣、督抚制度创于明代，翰林制度虽创自唐代，但在明代有重大改作，三者都是明代政制建构

的基石。研究三者明代政治中的职能、作用、地位及发展演变，是正确解读与理解明代政治的关键。正如关先生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所指出：“明代无论是中央政治体制还是地方政治体制；无论是官制还是吏制；无论是国家监控体制还是各级官吏的管理体制，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重大的变革。其中特别是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被废除和内閣制度、总督巡抚的相继创设；‘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的任官体制的莫立，以及与此相应配套的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国子监生历史特色的形成等，都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对其后清代政制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从而在中国政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对内閣制度的研究中，关先生针对明代内閣制度确立的时间问题，提出了“永乐说”。学界对明代内閣形成的时间问题有不同认识，有正统一正德形成说，甚至有迟至嘉靖一万历时期的首辅出现形成说，关先生认为，明代内閣制度有一个萌发、形成与发展过程，不能将票拟或首辅这些内閣成熟的职能、职位的出现，作为内閣形成的标志。关先生提出，洪武时期是明代内閣制度的萌发时期，“洪武朝所设之殿閣职，尽管在组织结构上尚未制度化，其作用亦

纪念

然而尚未完全做到规范化，但分省设抚，跨省设督，到嘉靖时期已经大体上定型”；“从巡抚和总督的职权与权力来看，他们已从单纯的中央督察地方官员，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从而突破了明初‘三司分立’的地方政制格局，并且与都察院所派出的巡按御史区别越来越明显，以致于巡按御史反过来对督抚（特别是巡抚），像对待其他地方官员一样实行监控。各地巡抚普遍设后，虽然都挂上了宪衔，但其职能已由中央官向地方大吏转化”；“从巡抚和总督的任职时间来看，已从短期的临时派遣，发展为长驻久任，开府置属，从暂设为定设、专设。这种情况从宣德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朝并无改变”。这一切说明，明代督抚已经具有地方大吏的职能与特征，表明督抚正在向常设性的地方管理体制过渡，只不过在制度的规范化、稳定化方面尚待完善，该论题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明代官制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翰林制度创于唐代，但在明代产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研究多关注于翰林的文书、咨议以及储才、育才职能，关先生则将其与明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内閣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揭示了明代翰林制度的特点。关先生指出，翰林与内閣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职掌上看，内閣的各顾问与制诰，本属翰林学士固有的职责，……因而初期殿閣大学士的增设，从组织形式上说，是翰林的入值；从职责上说，是对翰林官原有职权的一种分割与延伸”；“从成员上看，明代内閣不仅绝大多数直接来自翰林，而且他们在入值内閣之后，也未完全脱离翰林”；“从官署、文移上看，内閣所入值的文渊閣，历来是内府藏贮古今典籍图书之所，一向归翰林院掌管”。关先生同时亦揭示了明代翰林制度的另一重要特点——为科举入仕者开辟了一条由进士选入庶吉士，而达于翰林、内閣的途径。揭示了翰林与庶吉士制度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关先生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对明代典制的纯熟素养。

著名史家叶显思先生曾经评论：“这三篇专论环环相扣，对明代几大主要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考察，探微求真，分析缜密，层层剥笋，持论中肯，展现了关先生从事制度史研究的深厚功力，从而奠定了关先生在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作者为郑州大学特聘教授）